

大语文学术论集

主 编 王兴中
副 编 陈 斌 王 乙
胡 彦 王学智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摇摇大语文学术论集摇

“长眠”、“牺牲”、“就义”或“因公殉职”等；表达沉痛、惋惜的心情，用“停止思想了”、“睡着了”、“永远离开我们了”；通俗的说法有“老了”、“走了”、“不在了”、“过去了”；如果以乐观精神对待个人生命的结束，轻松的说法用“去见马克思了”、“如果我光荣了”等；表示鄙视的态度则用“丧命”、“蹬腿了”、“跷跷”、“玩完了”等等。

圆媛使用委婉语来表示尊重和礼貌

在我们日常交际中，常会接触到一些身体有残疾或生理有缺陷的人，在不得不触及敏感问题时，应该先考虑对方的感情，尽量避免带刺激性的词语，用委婉语来表示尊重。例如，把眼睛丧失视力叫“瞎”，这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但是由于“瞎”这个词有对人诅咒的意味，对一个盲人直接说你的眼睛瞎了，显然是不尊重的。于是人们就改用“失明”、“他再也看不见了”或“他从来就不知道世界的颜色”等等委婉的形式来表达。

猿媛为了造成文雅的格调色彩使用婉曲

有些生理现象，如果直接说出来则不雅或容易引起不愉快的联想，因此人们不愿意说它，而是使用各种各样的委婉说法。如把去厕所说成“方便一下”、“去下洗手间”、“上卫生间”等。关于人的身体，人体上的器官，人的若干生理现象以及性行为等等这些词语在社会上没有公开立足的地位，它们被完全按照社会传统习惯加以忌讳，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它们的出现也许不至于受到法律的惩处，但常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因此在交际中尽量避免它们，而采用委婉的说法，表达文雅的格调，使对方更容易接受，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源媛婉曲委婉含蓄，能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

当需要向对方提出批评、指责或提醒注意时，旨意要明确，但言辞应注意适当委婉，不要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使对方能在较为轻松的言辞中，体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加以改正。

例如：

林肯一直以具有视觉效果的词句来说话。当他对每天送到办公室的那些冗长、复杂的官式报告感到厌倦时，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他不会以那种平淡的词句来表达反对的意见，而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能被人遗忘的图画式字句说出。“当我派一个人出去买马时”，他说：“我并不希望这个人告诉我这匹马的尾巴有多少根毛，我只希望知道它的特点何在。”

缘常可用于外交场合，或处理不便回答的问题

在政治上和国际社会的交际中，应用委婉语词和委婉表现法，是使交际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或者能够取得较显著效果的途径。交际双方在特定语境中都知道所提的委婉语词指的是什么，因而双方都理解所表达的信息，但同时又因为没有点破所要表达的实体，遇到不顺利时容易“下台阶”。例如：

1972年，周恩来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宴会的祝酒词中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里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就是一种婉曲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委婉语，回避了直接说出1949年到1972年20多年里，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行为，既维护了我国的严正立场，又不失外交礼节。

三、婉曲蕴含的文化意蕴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镜像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海德格尔在《人与语言》一文中讲到“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意思是说“传统主要储存于人类的语言中，存在于人类对于语言的绵延不绝的理解中，存在言语者对语言的操作实践中”。因此，婉曲这一修辞格作为语言表达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运用隐藏着人类传统的文化和心理素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 摇大语文学学术论集摇

员媛婉曲的产生，委婉语的运用源于人类对语言的禁忌

“言语禁忌是指在言语运用中某些词语（包括文字）不许说（写）出或不许随便说（写）出。这一现象的根源也是对语言神力崇拜心理和把言语同事物或现象合而为一的错误想法。只不过它采取了一般崇拜中‘反复说出’的相反的方式——禁止说出，或禁止随便说出。”^①

语言禁忌也称语言塔布，“塔布”是英语 ~~噤~~ 的音译，意为禁忌和禁忌语。它是因人类还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生的。员愿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到了南太平洋加群岛，同那里的居民接触时，发现他们有很多奇特的社会现象，例如某些东西只允许特定的头等人物（神、僧侣、国王、酋长）使用，而不允许一般人使用；或只允许作为特定的用途，而不准用于一般目的；或不许某一社会集团（例如妇女）或某些人使用等等。那里的居民称这种禁忌为“塔布”。“塔布”这个词后来就进入例如人类学、人种志学和社会学领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禁忌的专用名词而被广泛使用。“塔布”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一方面受鄙视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因此，所谓语言塔布，实质上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灵物崇拜（语言拜物教）；一是语言的禁用或代用，即委婉语词和粗鄙语词。

语言禁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员）对表示不吉利的字词的避忌

由于人们从心理上对灾难、凶祸就有一种回避心理，表现在语言运用上也不愿用那些明显表示灾难、凶祸的词语和字眼，例如“棺材”与死有关，人们就尽量回避；结婚时不能送钟，

^① 崔梅、李江梅：《秘书语言学》[酝]，云南民族出版社，员愿愿年
版，第 圆源页。

摇语言修辞探讨摇◆

因为“送钟”与“送终”音同，也与死有关，这是人们最忌讳的。逢年过节，特别忌讳“死、鬼、杀、破”等字眼。甚至连“病”也忌讳，多用“不舒服、不自在、不得劲儿”等代替。

古代汉语有很多描述“死”的字词，这些特定的含有“死”的意义的不同的字词，带有很浓厚的阶级烙印。这个阶级成员死了，同那个阶级成员死了，使用不同的语词——“死”的委婉语词。甚至同一阶级而身份不同的人死了，也有专门符合他的身份的同义词。例如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了叫“薨”，五品以下官员的死则叫“卒”，五品以下直至庶民的死，直称为“死”，未成年的人死了叫“殇”，这些都是死的委婉说法。^① 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许多委婉语词也随着时间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失去了它的委婉性质。

（圆）行业忌讳语

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希望自己事业有成，兴旺发达。一切与此愿望相违背的东西都是受到排斥的，包括不吉利的话语。因此，行业语中同音禁忌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

新凤霞：等一会儿，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

把头李小眼：忌讳！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呐！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

另外，如行船不能说“帆”，而说“篷”，因为“帆”与“翻”同音；姓“陈”不能说姓“陈”，因为“陈”与“沉”同音，都是出海人的大忌。

（猿）问话的禁忌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酝]，商务出版社，圆园园年，第猿猿页。

◆ 摇摇大语文学术论集 ◆

提问在交际中是免不了的，但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应该遵从礼仪的要求，了解什么是可以问的，什么是不该问的，以及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问。问话方面的禁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问年龄。在问话中直接问别人的年龄常会令人不愉快。特别是中年妇女，对年龄就更为忌讳。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唐突地询问别人的年龄。询问老人的年龄应该用“您高寿多少？”“您老多大年纪啦？”等等，这样的问法，既符合礼仪，对方听了也感到舒服，并乐于回答。

问经济情况。无论是熟悉的人，还是初次见面的人，冒昧询问别人的经济收入、经济来源、经济开销、存款数目，或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富有，都是非常不礼貌的。

问婚姻家庭。婚姻家庭是最为敏感的话题，完全属于个人隐私，切忌随意询问。不能根据年龄就自作判断，问一些很可能触动创伤的事。因此，诸如“你的孩子多大了？”“你的丈夫在哪儿工作？”等等这些涉及婚姻家庭的问题都不要主动过问，除非对方愿意主动与你交谈。

问通讯地址。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交往对象的权利，在这些交往对象中，也有亲疏之分。因此，不要在别人不主动留下通讯地址的情况下就向对方询问，这就等于自己强硬把自己塞入别人的交际圈，而不是由对方自由选择。在别人不愿意受到打扰的情况下，打扰了别人，当然是没有修养的表现。当然，如果对方主动留下了通讯地址，说明他愿意进一步与你交往，你也应该留下自己的通讯地址，以示礼貌和尊重。

（源）数字禁忌

数字与其他语言符号一样，它们本身不是客体，也不是传统本身。但人们往往把符号看成客体本身，甚至有一种符号崇拜观念。

摇语言修辞探讨摇◆

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数字的好恶也不一样。例如，英语国家中，“在”和“猿”都是令人感到晦气的数字。与中国相同的是，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认为单数带有消极的色彩，而双数则是吉利的。如加纳把“苑”“猿”“猿”和“猿苑”都看成是不祥的标志。埃及人却觉得“猿”“缘”“苑”“怨”都是积极的，只有“猿”是消极的。韩国人忌讳“源”，日本人忌讳“怨”，因为它与“苦”字音相近。这些都是在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的不同心理支配所产生的结果。

（缘）人名避讳

人名是指称某一人的语言符号，由于经常和特定的人相联系，似乎就成为了这个人的一部分。于是在有些民族中就产生了一种迷信，似乎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就会对这个人产生不利作用。中国古人往往在名之外另起一个“字”，一般交往中只称字不称名，最初也是为了避免说出本名，沿用成习，称字不称名就成了尊重的表示。在中国古代，尊长者的名字是不能说出来的，不得已而说时，前面也要加一个“讳”字。平辈孩子间是不能称呼对方长辈的名字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名字所用的字（包括同音字）禁止在一切场合使用，由此产生了种种避讳方法。一种是改用同义或近义的字。如秦始皇名政，一名正，所以秦代称正月为端月。另一种是缺笔法。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代人除了把“世”改为“代”，还把“民”改为“人”。

圆媛婉曲折射的儒家思想

婉曲的产生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体现在：

第一，儒家的基本概念是“仁”和“礼”。“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本来就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心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则为“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既是制度，又是礼仪、礼节。由于“仁”与“礼”的互补，容易给人们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仁爱之心”

◆ 摇大语文学学术论集摇

和朴实厚道的“博爱”感情。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中华民族的基本心态之一。^① 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忽视人与物的物质关系。所以，因为身怀“仁爱之心”，受“礼制”的约束而不愿去伤害别人，触痛对方的伤处，转而用委婉的方式曲折、含蓄地表达意见，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社会习惯，婉曲也就在日常交际中出现了，并成为了礼仪文化的一种。

第二，儒家以中正和平作为他们的审美倾向。

“中和”包含“中”与“和”两层意思，具有特定内涵。《礼记·中庸》这样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

“中和之美”作为儒家的审美趣味的思想基础，表现在文学艺术中，有思想感情和艺术表现形式两个方面。从思想感情的角度看，就是要中正和平，即美刺讽喻的适中和感情表达的适中。从艺术表现形式看，就是要和谐。“中和之美”追求的是和谐的境界，但这种和谐，是以适中精神为前提的。“中和之美”的基本精神，正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或者说是中庸之道决定了中和之美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属性。中庸的思想，就是“过犹不及”的思想，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处，不过度，不偏激，持其中正。要做到不偏不倚、适中持正，就需要“和”。汉民族承受了几千年儒教文化的教化，儒学中“和”与“中庸”的审美观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取向。因此，汉民族注重和谐。

^①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酝]，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试述汉字“拼音化”的谬误

杨增海

语文改革的三块内容，即用白话代替文言，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推广普通话。今天，白话文的地位已不可动摇，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影视媒体的渗透，普通话的推广与运用也呈良好趋势，尽管因为港台地区“鸟语”的不良影响，普通话有变味的嫌疑。唯有汉字“拼音化”，前些年还大张旗鼓搞过一阵，如有一批小孩子学了两年纯粹的拼音（“汉语拼音文字”），到读高小的年龄却弃音从文，来改学方块汉字——偃旗息鼓了。这种半途而废，不了了之的做法，显然事先有欠考虑，难免以失败告终。

考虑到汉字“拼音化”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汉语文化的前途命运，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改革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须三思而行。

在主张汉字“拼音化”的声音中，公认的说法是汉字难写、难认、难读、难记、难于适应高科技的发展，因此不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有不容置疑的改革必要。因此，我们应该走“拼音化”道路。这个将汉字置于死地的说法未免含混不清，主观色彩甚浓，缺乏具体的、严肃的分析论证，是人云亦云，一哄而上。这方面较为系统的提法是这样的：（员）汉字难学，拼音字好学；（圆）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猿）现代社会要求高效率，汉字信息处理速度不及拼音文字快，要“拖后腿”；（源）汉字以外，世界上文字都是拼音的，这会成为我们参与国际交流的障碍。不可否认，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以上罗列各项，也是有

◆ 摇大语文学术论集摇

例可证的事实。实事求是地讲，汉字确实有改良的必要。

可是，“拼音化”究竟如何呢？有论者认为：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学的学制缩短一年，或者把学生的水平提高一级，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计，那么，光凭这两项就很值得了。“汉语拼音文字”前景一片光明、威力势不可挡？须知拼音首先是依附于汉字的注音工具，本身并不立足于语言，仅此一点来说，它是不是文字都值得怀疑。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拿来注音意的这套“汉语拼音”是文字吧，它的“可行性”又有多少、有多大呢？

拼音文字要通行，必须满足一个看似简单的前提条件，即实现普通话的彻底规范和全民通用。因为拼音只能靠区别读音的方法来辨析词义，假使读音不准、注音有误，在词义的理解或解释上，必定失之千里，产生种种可笑的甚至是可怕的谬误。只有民族共同语落实到位，人人皆以标准的普通话交际往来，拼音汉字才能广泛地被采用。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们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更何况，也许就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妥善解决了汉字自身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到了更为有效的措施手段，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从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即使使用字母文字的欧美国家，也不免存在方言土语与“普通话”的差别，所以才有“国际音标”来给他们的拼音文字加注“标准读音”。在历史的长河里，推行规范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也毕竟只是一种战略、一种理想，它所需要的时间（财力、物力姑且不计），应该不会少于学会几千个还不至于“难于上青天”的方块汉字。这种比较犯了“偷换概念”的毛病。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该清楚地看到：汉字“拼音化”，条件欠成熟，远不具备操作上的可能性。

下面笔者就谈谈“拼音化”在可行性上碰到的几个具体问题。

摇语言修辞探讨摇◆

首先，数量问题。众所周知，汉语的语素是以单音节为主，几乎每个单音节语素都具有意义，相应地，为了适应汉语词汇的单音节特点，汉字从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形体只有一个音节、一般只代表语言的一个词的特点。字、词最初大致是一致的关系，一字一词、一词一字。也就是说，每个汉字事实上都是一个单音节词，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词义。在另一方面，汉语音节的数量较少，据统计，《现代汉语词典》算上声调也只有 员猿园 个音节。这就导致汉字同音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收字 愿园园 员园园 的普通字典，平均就有七八个字同音；即便只算 猿园 个常用字，也平均有近三个字同音。同音字多，每个字又有各自不同的词义，这就必然导致，如果仅凭读音，我们无法辨别一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姓“~~揭~~”，只有借助形体，我们才知道它是“弓长张”，不是“立早章”。——但是换成拼音文字呢？

拼音文字不能解决单字（单音节词）的同音问题，因为从形体上来说，它们也是完全相同的，毫无区分的标志。这就必然使得：使用拼音文字必须拼写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倡导“拼音化”的已故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承认，拼音文字一定要分词连写。我们至今无从想像一种“消除”了单音节语素，开口闭口是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组的“现代汉语”，对不可思议的东西，最好不要妄加判断。笔者在此仅仅打算商议一下这些未来文词“拼音词”的数量。

拼音文字词多是有目共睹的，学英语的人都吃过背单词的苦头，想必会不寒而栗。随便打开一部八百页厚的《现代英汉词典》，它的词目就是四万条。而一部厚达一千七百页的《现代汉语词典》，其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约为五万六千余条。——如果说在未来你将要学习这个数量的“拼音文字”，你当作何感想，还能“中小学学制缩短一年”

◆ 摇大语文学学术论集摇

吗？而且这还不算什么，《汉语大词典》收词目的条数是 猿 万！……走“拼音化”的路子，拼词写词学词势在必行，拼音固然易写易记易认，如此庞大的数目字（词汇量，相当于生字）却同样触目惊心、横亘在前。我们谈“改革”，创新是好事，但它效果如何，又将带来怎样的弊端呢？仅此一项，即可指出汉字“拼音化”，不具备操作上的简单易行。

顺便引用一位老先生有趣的描述来强调上述观点——又如中国文字的“气”如何翻译？西方文字不同，氧气、氢气、瓦斯，究竟用哪一种气来代表？中国文字就不同了，一个“电”字，就有许多的妙用。在外文就不得了，现在外文有十几万字，真正常用的几千而已。外文系的学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这种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后，谁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将来非毁弃不可。而中国只要一个“电”字就够了，发亮的是电灯，播音的是电唱机，可以烧饭的是电锅、电炉，还有电影、电视、电熨斗，只要两个字一拼就成了，谁都懂。外文可不行，电灯是电灯的单字，电话是电话的单字，所以他们的物质越进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后，人的脑子要爆炸的。

字母文字都是这样，只有存在相当数量的单词并不停拼合新词，才能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倾心制造“中国英语”的人们可别忘了：拼音文字也不例外。将拿数以万计的复合词取代 猿 万个常用汉字，这种据说是本着“求易”原则的改革，就是“拼音化”注定了的、不可改变的命运。

其次，翻译问题。“拼音化”无异于生造一门全新的文字，这对使用汉字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将面临一个极其重要的古籍翻译问题，即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固有文明的继承与扬弃。我们一贯只知，外文是需要翻译的，翻译至少得精通两种语言，并且有相当程度的文学造诣。

汉字是单音节词，古代汉语更几乎是一字一词，一词多义；